



历史人物

徐一朋与耕茶大东旅社

□孙同林

在如东县耕茶镇的中市街口,有一座“大东旅社”,如今这里已成为红色旅游景点。

1961年10月,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《51号兵站》上映,片中作为新四军秘密联络点——51号兵站的大东旅社即是以耕茶镇大东旅社为原型。

提起大东旅社,不能不说说大东旅社的主人徐一朋。徐一朋(1892—1972),原名徐鹏,又名徐云生。生于东台县耕茶镇北乡姚家埭(今如东县耕茶镇)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他少年时期,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,1919年,赴法国勤工俭学,毕业于里尔大学,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。毕业后,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,学习期间,兼任中国国民党纽约分部机关报《民气日报》编辑。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,1925年,徐一朋在纽约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美国纽约支部的一名党员。根据党组织安排,徐一朋辗转莫斯科回国,赴广东与张太雷一道从事党的工作。东江之役失败后,徐一朋奉调回到江苏。

1927年,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。同年秋,徐一朋受中共江苏省委委任书记王若飞委派,返回东台耕茶。回到耕茶后的徐一朋,与中共东台县特别支部书记陈雪生取得联系,按照江苏省委黄逸峰的指示,徐一朋跟陈雪生一道在母里师范、耕茶、三灶建立了盐城地区最早的3个基层党支部,徐一朋担任耕茶党支部书记。

徐一朋以教师职业为掩护,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,先在耕北创办了新园初级小学。后积极联络地方名绅缪文功、蔡观明、蔡海渔等人,在耕茶西街创办了耕茶初级中学。徐一朋密切关注学生的动向,关心进步学生的成长,在学生中讲解革命道理,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,为党组织培养输送人才,一时间,耕茶中学成为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中心。

1938年3月17日,南通沦陷。3月25日,日军入侵东台。徐一朋根据党组织的指示,将学校转移农村。待形势好转,徐一朋便重返耕茶,复任耕茶初级中学校长,兼任耕茶救济院院长。

徐一朋在耕茶初级中学增设高中部,扩建校舍,改名为私立耕茶初级中学。在徐一朋的指导下,许多学生陆续奔赴抗日战场,参加新四军、八路军。

不久,徐一朋接办了《滨海报》,任社长,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抨击封建势力,鼓励动员广大青年参军抗日,一时间,《滨海报》成为影响广泛的进步报纸。

1940年11月5日,徐一朋作为苏北参政会参政员,参加了苏北临时参政会,聆听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、军长陈毅的讲话,响应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,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。是时,徐一朋被委任为抗日民主政权东台县县长。

1941年春,苏北党政军领导机关从海安迁往耕茶。4月,苏中军区成立大会在耕茶镇徐氏宗祠召开。徐一朋在会上发言,同时,由徐一朋主编的《滨海报》上发表了《我们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力量》的社论。耕茶的抗日形势进入高潮,组建起耕茶抗日游击大队,该游击大队后来成为耕茶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。

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,耕茶的商贸也日渐繁荣,一时客商云集,耕茶镇仅有的客栈——马栈房已难以继。徐一朋决定建造一个新客栈。

经过多方筹措,一座由徐一朋亲自绘图、拆迁、督工的建筑正式开工。该建筑分前店后宅,前面为三间店铺,店铺屋架为穿斗式结构,进深六界。大门墙两层全以青砖嵌线,图案凸现,线条流畅,外观秀美,颇具欧式风格,客房皆推窗亮格,古朴典雅。

客栈位于耕茶镇中市街49号,定名为正中客栈。客栈名为贸易,实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。徐一朋经常在客栈里接待学界名流、中共要人。正中客栈为苏中军区四分区传递情报、运送物资,护送首长,完成了许多特殊任务。

解放战争时期,中共党组织在耕茶组建鸿济公司,负责上海至苏中、苏北战场人民解放军军需物资的筹集和运送。正中客栈又成了鸿济公司人员经常出入的场所。镇上军统特务经常在深夜到客栈突击检查,客栈经理王保田在徐一朋的授意下谨慎应对,他们像电影“51号兵站”的店主那样,巧妙应付,掩护好地下党组织接头的人员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,正中客栈改名为大东旅社。徐一朋曾任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设辩护人和上海曙光中学校长。1972年病逝于上海,享年80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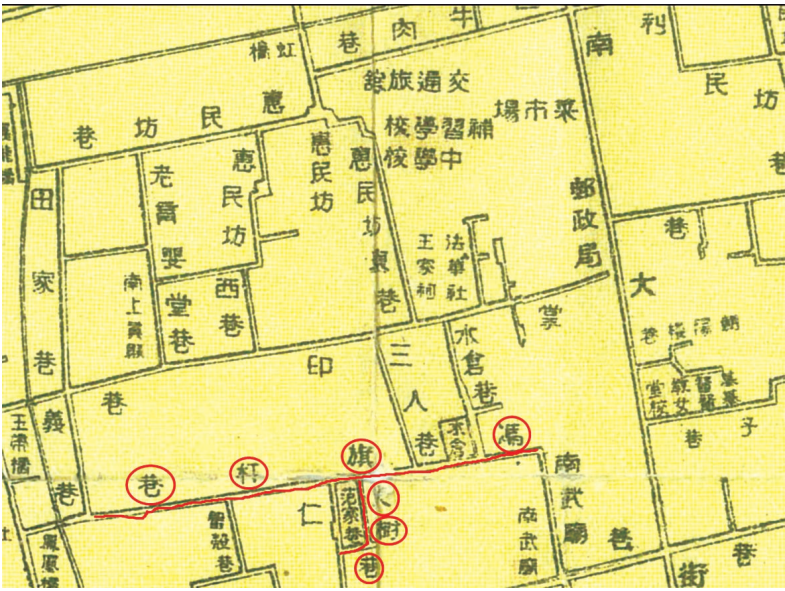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也谈冯旗杆巷的得名

□赵鹏



民国南通地图里的冯旗杆巷和大树巷



原大树巷内冯宅的近景

地名掌故

冯旗杆巷在南通老城的西南片区,顾名思义,其得名来自于冯姓人家所立的旗杆。这个旗杆,准确的名称应叫作“功名旗杆”,是科举时代为考中举人以上功名者而竖立的,乃一种家庭荣耀的表示。取得功名者不一定都得竖旗杆,通常也以考中进士者为多,中了举就竖旗杆的并不多,除非有些特别值得炫耀的事。

多年前孙模兄编书,涉及冯旗杆巷的来由,曾告以《南通地名志》谓其得名为“巷内有清代冯梦龙宅,宅前有旗杆”,他怀疑这个说法的准确性。我则由此而忆起一事,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通作地名普查,某公访得南通冯氏中一位冯梦龙的名字,以为就是《三言》的作者,欣喜逾常,逢人便告。其实此事稍加辨析就可以清楚,写《三言》的冯梦龙是明朝末年的苏州人,而南通这位冯梦龙却生活在清朝的雍乾时期,两位除去同名外,其他什么都搭不上。那时市里正值编写《南通地名志》,编者估计看到冯家实在举不出什么响当当的人物,就抬出这个冯梦龙来蹭名人了。南通这位冯梦龙只是个附贡秀才,他是不够资格立旗杆的。模兄当年曾参与《地名志》的工作,这个背景他应该也知晓,所以在他编的书里不认同此巷得名于冯梦龙之说,因而有了“冯旗杆巷之定名便成为待解之谜”之语。

我因模兄相告,始知有此巷名之谜,由此也稍加留意。偶与朱友山先生聊及冯旗杆巷,他说自己虽未见过巷内

竖立的旗杆,但插旗杆的石头却亲眼见过,并闻老辈指谓,此即冯家的旗杆石。当时此石在巷内某宅墙根,已作为铺路石块用了。据朱先生讲,石上并排有两个插旗杆的圆洞,其洞约成人拳头大小,以此来看,旗杆之柱应该很细。我后来据外地所存旗杆石实物观察,朱先生的说法其实有误,此石上的两洞并非插旗杆用,而是贯以横木来固定旗杆者,所以旗杆不会很细。

朱先生家住与冯旗杆巷相邻的掌印巷,且一直留心地方掌故,他说早年看到旗杆石,是可以相信的。只是其晚年已被搬迁出城,且年事已高,我曾动念请他去巷内指认所见该石位置,却是因循未果,可惜他已于去年离世,如今只得抱此遗憾。

最近此巷得名之事又被提起,本不想凑这热闹,只是想想自己既然有所注意,并且认识又多从分析史料而来,所以也想说说。

先从史书说起。南通城建于五代后周之时,早期城内居民区采用的是坊里制,即以坊为居住单位。明嘉靖《通州志》记街坊,其属县海门有街有坊,而通州却只有坊而无街巷名。位于州治西南的是惠民坊、依莲坊和武定坊。到万历《通州志》里,才开始有坊里和街巷并记,这似乎反映着坊里制与街巷制的开始交融。其所记西南片,除原有三坊仍存外,始出现依莲巷、线长巷和南关王庙巷三个巷名。

清乾隆《直隶通州志》记市巷,西南片三坊仍存,而街巷却只记有西牛肉巷和掌印巷。编者于市巷部分曾打招呼说:“所载俱近通衢,旧有名称可记者,因为列书。其餘曲径陋巷,无挂漏。”按冯旗杆巷的规模,与南邻的南关帝庙

巷、北邻的掌印巷不相上下,不能算是“曲径陋巷”,由此似可认为,那时候“冯旗杆巷”这个巷名还没有出现。

光绪初的《通州直隶州志》,卷首《州城隍图》上绘有这条巷子,但没有像掌印巷那样标注巷名,然而在卷一“市巷”部分,却出现了“冯家大巷、小巷”的名字。对应着看,这个冯家的巷,应就是冯旗杆巷,而小巷则是冯旗杆巷内向南支出“大树巷”。大树巷的得名也与冯氏有关,那是因为南通冯氏自认是汉代大树将军冯异的后裔,并以“大树堂”为家族的堂名。早期的大树巷向南,西拐后与仁巷连接,只是后来民房增多,南端被塞,如今成为一条死巷。近代在地方上著名的冯薇馨、冯静伯父子,其住宅就在这条巷内。志称“冯家大巷、小巷”,似乎反映着这两条巷名那时还不太固定,推想彼时或许也有“冯旗杆巷”这个别称存在于民间口头的。到了民国十四年印制的《南通县市图》上,则已明确标为“冯旗杆巷”和“大树巷”,同年县警察局调查城厢街巷户口职业,这两个巷名也赫然在列,至此,冯旗杆巷的名称才算被官方确认。

通过史书分析,大致可以判断,冯旗杆巷的名称,应出现于清代后期。既然得名于巷内冯氏所立的旗杆,那冯家有谁能够具备资格竖立旗杆,这也应该探讨一下。

按冯姓虽是南通大族,但在科举上,高等人才并不特别兴盛。有清一代,自乾隆十五年的冯霖开始,至科举废除,考中举人者总共八位,其中有一位更考中进士。中举者没有什么可以特别炫耀,所以竖旗杆最有可能的就是三位进士中的某人。

在这种国际呼声中,1928年4月4日,具有西方基督教慈善机构背景的中华慈幼协会在上海成立了,理事长是孔祥熙。中华慈幼协会成立后,与美国相关慈幼机构合作,寻求资金救助中国贫穷儿童。1931年3月,慈幼协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把每年的4月4日定为中国儿童节,得到国民政府支持。

为什么时期定在4月4日呢?主要原因就是因为4月4日是中华慈幼协会成立的日期。这是对慈幼协会的一个纪念。儿童节和慈幼协会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,都是保护、救助儿童。在这一深意背景指导下,对它的诠释也浮出水面。如蔡元培的解释,选定4月4日,一是因为气候论,“盖以时期正值春令,且届植树节(植树节初为孙中山先生倡议的清明节),以气候论,南北相同”。二是含义论,“第一个‘四’,即食、衣、住、行。第二个‘四’,即智、体、德、美”。再一个是“四四”的命名习惯,与国民政府其他纪念节日的命名习惯相

气、生态、环保、不臭脚。当然,走起路来“喀喀喀喀——喀喀喀喀”地响,对小孩躲猫儿寻(捉迷藏)、做游戏也不方便。

木板拖鞋的制作很简单,找来废旧的木板料,按照脚板底的尺寸,适当放点余地。木板好不过是杉木,杉木不怕水,不变形。没有杉木,杂木板也行,找到什么料,就用什么料,搭僵一点、马虎一点,无所谓。为了防止木板打滑,可在木板反面再刻画若干条线条。木板搞好了,再找两小段帆布的或橡胶的带子往木板前面一钉,一双木板拖鞋

同,如“十国国庆节”,“九九”重阳节,“七七”七夕节,“五五”立夏节,“三三”上巳节,“相相辉映而不冲”。

此提议通过的翌年,即1932年的4月4日,中国就过上了第一个儿童节。但当时仅限于较大城市而已。随着国民政府颁布了《儿童节纪念办法》,1935年儿童节正式成为全国性的节日。通知地区也和全国一样,1935年的4月4日,城乡各小学举行儿童节纪念活动。据相关资料记载,如师附小纪念大会的程序为:奏乐、肃立、升旗、唱党歌、恭读总理遗嘱、校长致辞、儿童代表答词、呼口号、童子军队列表演、接受社会赠品、奏乐、散会。如城孔庙小学、安定小学纪念大会程序也大致相同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那年11月,为了纪念1942年6月被纳粹德国刺杀的捷克儿童,由苏联牵头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建议,把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。次月(也就是12月23日),中国政府决定把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定为中国的儿童节。至此,旧中国“四四”儿童节废止。

就算完工了。因为木板拖鞋简单,故旧时北三县有俗语:“没有马马儿(老婆),烂眼儿也好的;没有鞋子,拖鞋(亦即木拖鞋)也好的。”

过去,洗澡堂子的拖鞋都是木板拖鞋,浴客洗好澡后,一个个的拖着木拖鞋往浴厅里走。我高中时有个同学特喜欢穿木拖鞋,1980年他以化学满分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,进了大学,每天晚上仍穿着他的木拖鞋到洗盥间洗盥。他的动静,半个楼层的人都知道。现在他早已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了。

民国时期“四四”儿童节

□程太和

史海回眸

1949年12月23日,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“六一”国际儿童节(为了纪念1942年6月被纳粹德国剿杀的捷克儿童,“保障儿童生存权、保健权和受教育权”,由苏联牵头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建议,把每年的6月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)为中国儿童的节日。1950年3月30日,教育部发出通告,规定6月1日为儿童节,废除旧的“四四”儿童节。旧的“四四”儿童节就是民国时期的儿童节。

不论是民国时期的“四四”儿童节,还是现在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儿童节都可以说是中国引进的外来文明。

关于民国时期“四四”儿童节的来源,得从20世纪初说起。1900年,瑞典教育家艾伦凯发表了一个声讨旧教育的概文《儿童的世纪》,提出20世纪是“儿童的世纪”,引爆舆

木板拖鞋

□何台

传家宝

提起木板拖鞋,好多人都说,几十年不见了。但在网上一搜,这种拖鞋还是有的。有男女款情侣式木拖鞋29元起售,有日式木屐拖鞋18.8元起售,有新款日式木板拖鞋36.4元起售。这种价格,说贵也贵,说不贵也不贵。说贵,是因为木板拖鞋的制作很简单。说不贵,是因为现在人工成本很

大。笔者没有为生产商做广告的意思,只是传递一个信息,这种拖鞋没有消失。

提起木板拖鞋,就想起了孩提时的夏天的晚上,木板拖鞋是唱主角的。不仅男人穿,女人也穿;不仅老人穿,小孩也穿。白天赤脚劳动,晚上洗过脚之后,就拖着木拖鞋走东串西,“咯嗒——咯嗒——”的响声在乡村的小道上回荡。这就像春天要有布谷鸟的歌声,夏天要有蝉的合唱一样。夏天不能缺少木板拖鞋的声音,不然这个夏天太单调了。穿木板拖鞋的好处是宽大、光滑、透